

## 论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1949年后诗作中的“红色”思想变迁

涂, 鸿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 教授

秋吉, 收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国際文化共生学部門・国際文化学講座

<https://doi.org/10.15017/7153206>

---

出版情報 : 言語科学. 50, pp.25-38, 2015-03-31.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言語研究会  
バージョン :  
権利関係 :

# 论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 1949 年后诗作中的“红色”思想变迁

涂 鸿<sup>i</sup> 秋吉 收<sup>ii</sup>

**摘要：**对于郭沫若在 1949 年后的诗歌写作，无可否认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紧密相联。因而歌颂中共及其革命的“红色”政治作品也的确贯穿于这时期的诗歌创作。但他的“红色”思想，却在当时政治氛围和他自身情绪状态的结合下，在此阶段发生着变化。这是从最初的发自内心的与“红色”思想的契合到最终走向高压政治思想下无奈的“红色”诗歌写作，是诗人思想从内心的自愿到在高压政治下的受外界的强迫的结果，他的内心是荒诞和扭曲的。因此该文关注的是郭沫若 1949 年以后的诗歌写作中“红色”思想变化的过程，并由此认识其心理历程，从而反观历史与时代的本质。

**关键词：**郭沫若 1949 年后 “红色”思想

尽管中国国内外有许多人对郭沫若（郭开贞，1892—1978）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却是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同时他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该文仅将他作为诗人的角度，分析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探寻其诗作中有关当时政治话语的抒写，对国家意识的表现，对中国当时领导人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歌颂的心理背景及其思想变迁。

郭沫若从 1949 到 1978 年所作的诗歌数量巨大，在 1984 年出版的共二十卷的《郭沫若全集》中，诗歌占了四分之一，共新诗和旧诗一千五百余首，出版有《新华颂》（1953）、《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1955）、《百花集》（1958）、《百花齐放》（1958）、《长春集》（1959）、《潮集》（1959）、《骆驼集》（1959）、《东风集》（1963）、《蜀道奇》（1963）、《邕漓行》（1965）等。郭沫若逝世后由他人编选的还有《沫若诗词选》（1977）、《东风第一枝》（1978）、《郭沫若游闽诗集》（1979）等，共 13 部之多，另一些诗作因某种原因并没有收入。在这五卷中的后三卷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作的诗作，而写于 1967 年之后的诗歌却只有二十余首，但中国当代国内大多数学者并不愿意谈论他这段时期的诗歌，因为他们认为郭沫若这段时期的诗歌失去了诗性，统一于“红色”思想，全是为“红色”的政治服务的工具。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其核心价值是对革命话语态度的变化，80 年代以后可以称为‘告别革命’年代。”<sup>[1]</sup>正因如此，被中国共产党定为“鲁迅”的接班人的郭沫若在文坛上的

[i] 涂 鸿（1963—），男，中国成都，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ii] 秋吉 收（1964—），男，日本福岡，九州大学言语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秋吉曾在 2014 年 12 月受涂教授邀约到西南民族大学作了报告，使这次论文的合著得以实现。西南民族大学位于中国四川省，是郭沫若的出生地，而秋吉所属的日本福岡市的九州大学的前身正是九州帝国大学，郭沫若当年从该大学医学部毕业。

地位已就不能与往昔相比。许多学者甚至一般民众都对他这时期的行为、言语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认为他诗歌的写作只是一些政治宣传与“媚上”的举动。加之郭沫若与忘年之交青年学者陈明远（1941—）信的公开，许多人更是找到了证据证明郭沫若的“言行不一”，因此这些学者以此为剧，大量撰文批判郭沫若。但是在这些针对郭沫若评论中，对于他的批判是占上风的，这对于当代文坛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而在这些批判中，尤其是对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诗歌进行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学者们认为他的诗歌只是对“红色”政治做宣传，正因为这样的言论以至于许多学者称郭沫若为“党喇叭”。因而这个时期的诗歌也是为当代的许多学者们所不屑提及，偶有引出也只是为了批判郭沫若而拿出的证据，正如学者冯锡刚（1960—）所说：“以诗证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郭沫若的诗作）不失为有意味的材料。”<sup>[2]</sup>从此句话的语气和内容就可看出与冯锡刚一样的学者们对于郭沫若诗歌的态度。

但是评论一个人应该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仔细阅读他的著作，才能进行评说，而非人云亦云。中国现代思想家、作家鲁迅（1881—1936）认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sup>[3]</sup>只有在对当时的社会状态和作者的全面了解后，才能全面地评论一个人的作品。

### 一、在对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的关注中生成了早期红色情怀的心理背景

中国“五四”时期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与洗礼，是郭沫若红色革命思想形成的基础。19世纪末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是分崩离析，五四运动前夕他在中国内陆的城市成都读书时就接受了中外新思想影响，1914年春他去日本学西医，但与中国国内联系密切，热衷于文艺与政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岡九州帝国大学学习时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其诗集《女神》（1921）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于日本东京组织成立了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3年以后他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国红色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1899—1935）影响下，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站在民众的立场来创作，其作品多数传达的是追求个性解放，反抗黑暗现实，向往自由等思想。在创造社时期，郭沫若还翻译了德国思想家、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小说展示了主人公维特的思想感情变化，以喷涌的激情描写青年维特的憧憬与绝望。以主人公恋爱的不幸来放大社会的问题，对封建的等级偏见，小市民的自私和守旧等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评，借此宣扬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青年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个人价值的强烈愿望。这实际上也是他早期关注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的“红色思想”的萌生。

由文学家，历史学家向政治家的转变并非偶然。1923年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完成了医学学业回到中国，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年时间里，他从宣传科科长迅速升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并且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因对同样曾在日本学习军事，时任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的蒋介石（1887—1975）的政治态度颇有质

疑，并且对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满，于是在中共重要领导人朱德（1886—1976）南昌家中作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sup>[4]</sup>，与蒋介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被通缉，导致了他1928年流亡日本，居千叶县市川市。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并没失去生活的理想与激情，由于受到监视，只能从事与政治无关的活动。他重读《易经》，学习甲骨文，探索古代社会形态，开始了古文字的研究。1929年，郭沫若完成《甲骨文字研究》<sup>[5]</sup>，这部著作曾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

早在1924年郭沫若曾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河上肇（1879—1946）的论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思想上开始发生转变。从不久后他给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中国现代作家成仿吾（成灏，1897—1984）的信也可见一斑，在信中他写道：“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折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sup>[6]</sup>从话语中可以了解到郭沫若在那本书中所受到的震撼，也因为这本书，他有了初步的社会革命的思想基础。

1937年，中日战事全面爆发，郭沫若弃家只身潜回国内，投身于政治、文化活动，在上海任《救亡日报》社长，上海沦陷后，又辗转在广州复刊，他在复刊中称“文化若亡，民族将永归沦陷”。1938年郭沫若在时任中共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1898—1976）的规劝下，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政治文化宣传，积极加入到抗日运动中。从此郭沫若为抗日而奔波，处处都能听到他慷慨激昂的演讲，正如周恩来对郭沫若评价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文化的班头”。<sup>[7]</sup>周恩来的评论，也反映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对郭沫若的基本认识。

郭沫若还于1942年在凤子主编的《人世间》（上海）发表了《青年哟，人类的春天》<sup>[8]</sup>一文，他宣称：

我们要发挥我们文化民族的使命，便不得不斗争。没有斗争便没有文化。目前的世界有极端疯狂的暴力正在向着文化摧残，向着创造文化的精神摧残，把人类拖到黑暗的悲惨的死亡地狱。我们要从这世界末日中把文化救起，把创造文化的精神救起，救起自己本身，救起全民族，救起全人类。

这些言辞更表明了他积极投身社会政治革命的理想。抗战期间，郭沫若还创作了《屈原》（1942）、《虎符》（1942）、《南冠草》（1943）、《孔雀胆》（1943）等历史题材的话剧，激发在“抗战”低迷中人们的士气，带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在1948年离开香港去北京的前一天，郭沫若曾作诗一首：“平生作金鱼，惯供人玩味。今夕变蛟龙，破空且飞去。”<sup>[9]</sup>由此诗也可见当时他感觉自己将从“金鱼”变“蛟龙”的激动之情。去北京后，他只是远离中共核心话语中心的“民主人士”，此时半生漂泊无定，生活苦楚的郭沫若却受到当时亟需各方面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极大的礼遇并对他委以重任<sup>[10]</sup>，他也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声誉在国内和国际活动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尽心奔走。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的文艺界出现了针对知识分子思想问题的“武训事件”、“俞平伯事件”、“胡风事件”、“反右运动”，甚至一些资深中共作家丁玲、陈企霞、艾青等也被指责其作品

的思想有问题。而郭沫若在国民党的统治时期曾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虽然他最初担任这一职务是因为周恩来对他的劝导，但这种背景使郭沫若在新中国的位置显得尴尬。加之他从北伐开始就与国民党高层中的一些人有着密切关系，这就使得郭沫若在那时发出感叹：“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骄傲自满，就会成为‘右派’。”<sup>[11]</sup>发生的这一切让他感到作为一名民主人士更应该跟随党的政策，更加应该纠正自己的思想。他曾说过：“对于一位作家的冷遇、冷淡，对于一篇作品的冷言冷语，对于作家是最可怕的毒。”<sup>[12]</sup>可见其郭沫若对于自身所处状态的看重，而此期间的郭沫若受到中国共产党很高的礼遇，并且他的心情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沸腾状态之中，因而各种运动对于他此时热情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干扰，而是更加坚定了他跟随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郭沫若是一位热情并有才情的诗人，而中国此时期的情况正好配合了他那颗热情的心。中国共产党给予了他很高的礼遇，并指定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的“接班人”，他此时的地位当然不可小觑，他此时的心情也可想而知了，而表达此心情的最好的方式，当然是用他最熟悉的创作形式——诗歌来抒发此时心情，因此郭沫若诗歌创作中的政治意识越加强烈，因为此时的他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政府，及时抒发他心中的“红色”情怀，此时的郭沫若带着他这颗真挚的“红心”去热情地赞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新生活。

## 二、以热切的心和强烈的政治意识为新时代献上真挚的“红色”颂歌

正如郭沫若在1951年11月写下的《多谢》一诗中所说的那样：“时代是这样的波澜壮阔，我们并肩前进，使我感觉到业已恢复了一去不返的青春。”<sup>[13]</sup>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本身具有诗人气质的郭沫若沸腾了，他曾说：“我自己的本心在期待着，总有一天诗的发作又会来袭击我，我又要如冷静的火山重新爆发起来，在那时候我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我要充分地写出些为高雅人所不喜欢的粗暴的口号和标语。”<sup>[14]</sup>此时的情绪，也正适合他喊出他的诗句。一首《新华颂》（1953）<sup>[15]</sup>代表了郭沫若20世纪50年代颂歌红色旋律的基调，该诗也被许多评论者广泛引用，诗人从对中国人民的歌颂转入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最后表达出对中共领袖的歌颂：

—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地红。  
生者众，物产丰。  
工农长作主人翁。

—  
人民品质，勤劳英勇。  
巩固国防，革新传统。

坚强领导由中共，  
无产阶级急先锋。  
现代化，气如虹。  
国际歌声入九重。

.....

由此诗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郭沫若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共领袖的饱含着的深情，他在此诗歌中也体现出正因为他们的完美综合才有了新的中国，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是真挚的。

这期间他写的《访“毛泽东号”机车》更能体现他对新时代劳动者真挚的歌颂之情。这是一首叙事诗，诗人先从他登上“毛泽东号”机车写起，然后就是司机长岳尚武的介绍。他在诗的最后一段写道：“在下车前我打从窗口上向外边眺望，祖国的天地弥漫着社会主义的春光。六万万人的岳尚武在向着我招手，庄严的五星红旗在春风中四处飘扬。”<sup>[16]</sup>想必此时的郭沫若充满了激动，在他的眼中“社会主义的春光”迷漫在祖国的天地之间，如果人人都是“岳尚武”那么“大同世界”不久就会来到。

这种愿望也正好和他在写此诗的前几天写的《愿六亿人民都成先进》产生出一种契合，在那首诗中他首先总结了历史上生产者们的光辉业绩，随后对新中国的生产者在建设中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进行歌颂，最后他希望“六亿人民都要成为各项的生产先进”，<sup>[17]</sup>这种愿望与岳尚武所说的相结合，正好让郭沫若的心理得到了一种满足，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景充满希望的一种满足，也是一种希望与事实相结合的一种满足。因而此期间的诗中那种红色情怀的确是真挚的为之激动。

如果说新的时代先进的生产者可以让郭沫若那颗“红心”充满希望的跳动，那么新中国的建设成就那就让他那颗“红心”为之雀跃。当他听说“武汉长江大桥”提前两年完成时，他于1957年9月20日发表了诗作《长江大桥》。此时的他并未看见“武汉长江大桥”，而是在同年9月28日他才亲自去武汉观赏了长江大桥，在观赏之后他于9月30日又发表了《长江大桥》的修改稿，当《沫若诗词选》<sup>[18]</sup>选录此诗时，改作现在的人们知道的题目《武汉长江大桥》。这首诗从最初闻喜讯，而立刻到见其实物，又立刻修改原稿可见其郭沫若的心情是充满了激动之情。

郭沫若曾说自己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从他在五四时期所作的《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作就可见其有一颗容易激动的心。他是一个受到一点触动血液就会沸腾的诗人，看着新中国的变化这让他为之沸腾，他在《武汉长江大桥》中直抒他的情怀，他写道：“它是难以比拟的，不要枉费心机，它就是它，它就是武汉长江大桥。”<sup>[19]</sup>并称长江大桥是新中国八年的建设的里程碑。在此诗中他也用古人之口来歌颂建设长江大桥的新中国的人民，他写道：“诗人李白如果生在今天，他会产出新的诗篇，于崔颢无愧。他会歌颂人民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真正是使高山低头、江河让位。琴师伯牙如果生在今天，他会弹奏出工业化进行曲，不仅仅志在高山，志在流水。”<sup>[20]</sup>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新中国的变化之歌颂，尤其是对新中国人民为此所做的贡献更是满怀激情地颂扬。

正因为郭沫若心中充满真情，也就使他热情的歌颂着新中国的新面貌，并在诗歌中呈现出

人民生活中快乐的状态。1957年1月他作了《试和毛主席韵（词三首）》的诗歌（《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他在词中对新中国的新面貌，民众的幸福生活发出了由衷的赞美。从这三首词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当时中国人民生存状况的改变非常满意，他此时的“红色”诗歌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歌唱，因而他用诗歌歌颂新中国人民的快乐生活，抒发自己心中的喜悦之情。

在郭沫若20世纪50年代这些颂歌作品中，其中一首《骆驼》<sup>[21]</sup>在中国同时代的诗作中其艺术水平是很高的。

骆驼，你沙漠的船，你，有生命的山！在黑暗中，你昂头天外，导引着旅行者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暴风雨来时，旅行者紧紧依靠着你，渡过了艰难。高贵的赠品呵，生命和信念，忘不了的温暖。

春风吹醒了绿洲，贝拉树垂着甘果，到处是草茵和醴泉。优美的梦，象粉蝶翩跹，看到无边的漠地化为了良田。

看呵，璀璨的火云已在天际弥漫，长征不会有歇脚的一天，纵使走到天尽头，天外也还有乐园。

骆驼，你星际火箭，你，有生命的导弹！你给予了旅行者以天样的大胆。

你请导引着向前，永远，永远！

此诗是一首有寓意的诗，诗中的“骆驼”有“导引”的作用，是郭沫若心中的“明灯”。他将“骆驼”比作“沙漠的船”、“生命的山”、“星际火箭”、“生命的导弹”，而写这首诗的前二天，正好是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给人们展现了一幅新中国的美好前景。在写此诗的当天，郭沫若代表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向大会致祝词。由此背景可见在郭沫若的心目中能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骆驼”的本体当然就不言而喻。诗中最后一句写道：“你请导引着向前，永远，永远！”<sup>[22]</sup>也使得这一答案呼之欲出。只有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真挚的感情才会产生出如此深刻的意象，也表现了诗人将永远跟随着中共的脚步前进的决心。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他写了《顶天立地的巨人》这首诗，诗中用一件件事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功绩，用事实歌颂了中国共产党。虽然用事实写作是因为当时文坛正提倡运用革命现实主义手法，而这一手法与郭沫若当时的诗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相融合的，因为在当时用事实表达其诗人的感情可显示其真实性。

同时郭沫若还歌颂了毛泽东，他在《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一诗中写出了“工人阶级”、“农民”、“钢铁战士”中国当时的三大主力军，在新中国时期努力工作的原因是他们的精神动力的来源是“毛泽东的旗帜”，也就是毛泽东的思想鼓舞着人们努力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郭沫若歌颂了毛泽东思想是新中国的精神源泉，这些诗歌也都体现了郭沫若对领袖的深情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因事而感动，因事而生情。

在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诗歌中经常会出现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个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与中国》这首诗中，他在诗的第一节讲述了中国为何接受“十月革命”，在第二、三

节中诗人直接抒发对苏联的感激之情，也讲叙了苏联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就像他诗中所设问的：“没有苏联，世界人类的前途谁能设想？没有苏联，有好些国家不是早已灭亡？”<sup>[23]</sup>并随后回答出“苏联是人类的大救星”<sup>[24]</sup>可见其对苏联的感激之情。他在诗的最后写道：“光荣属于无产阶级的导师和父亲，永垂不朽的马克思、恩格思和列宁！光荣属于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者，苏联的党和两万万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八万万人民的友谊不可战胜！”<sup>[25]</sup>这种感情似乎让我们又一次领略到《地球，我的母亲！》诗中的激情。

郭沫若对于苏联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当时并非郭沫若一个人有这种情感，应该是新中国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情感，在《欢迎—献给伏罗希洛夫主席》一诗中，他用诗记录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洛夫从北京机场出来去南苑的路上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的情景，“百倍的万人空巷，在打着鼓，敲着锣。”、“欢呼声震动大地，北京城翻滚人波。”<sup>[26]</sup>虽有其夸大之处，但是也可见中国人民对苏联领导人的热情。这也从另一面表现出郭沫若和当时中国人民一样都对苏联充满了感情。因为这种感情的存在，郭沫若对于苏联所发生的事情的歌颂就如同对新中国的歌颂一样。

在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卫星，而这年十月也正是“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的纪念日，郭沫若于同年11月2日随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祝典礼。在这期间他发表了《第一个人造卫星的讯号》、《歌颂十月革命》、《十月誓辞》、《月里嫦娥想回中国》、《两个人造卫星的对话》、《和平的花朵》、《天堂已经建在人间》、《阿Q精神》等大量的诗歌歌颂“十月革命”和苏联卫星发射成功，并为苏联欢呼。在这些诗篇中诗人发出苏联的成功就等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成功的感慨，也表达出苏联的成功就是中国的成功的感慨。他在诗中还写出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对全世界无产阶级人民的意义，也写出了冷战时期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对于当时西方国家的震慑作用，从此可理解郭沫若对苏联的赞颂源也有其另一层含义，这也是诗人强烈的政治意识影响的结果。

郭沫若在1949至1957年这段期间的诗歌中大部份都是用自由体写的新诗，这正是诗人希望直抒自己心中之情所引起的。他曾说，要直接表达感情还是新诗便宜一些，而这时期的诗人也正用一颗真挚的红色情怀去抒写对新时代真情的颂歌。

### 三、狂欢高亢时代中“红色颂歌”的媚俗抒写与诗人内心的荒诞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跨入毛泽东构想的“大跃进”时代时，这使沉浸于新中国建国激情中的人们更加沸腾起来。在当时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受此感染，这也源于他们的政治热情，他们都希望新中国尽快地强大，可以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因而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愿意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在1958年2月13日至16日，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各研究会分别召开会议，讨论文艺创作“大跃进”问题。1958年2月25日上海作家协会受极左思想影响，向全国作家们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sup>[27]</sup>的一封信：“六亿人民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潮已到，人人兴奋，个个当先，随时随地出现奇迹。一天的奇迹就够写成许多部史诗、戏剧和小说的。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同志们，我们怎能不高兴，不狂喜，不想变成三头六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双管齐下，快马加鞭，及时报道，及时歌颂，

鼓舞更大的干劲，叫前人所不敢想的每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实现在我们眼前呢！”<sup>[28]</sup>对于这样的号召立刻得到了作家们的积极响应，“巴金（李尧棠，1904—2005）提出在1年内，承担写1部长篇小说，3个中篇，再加上搞些翻译；田汉（田寿昌，1898—1968）宣布将写10个舞台剧本和10个电影剧本。”<sup>[29]</sup>这样的例子在当时是相当多的，而对于处于新中国政府高层的“鲁迅”接班人——郭沫若更加认同这一点，也不会居于人后。1958年和1959年这两年可谓是郭沫若诗歌的高产年，有许多的学者称这两年为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狂欢节”。当时的高亢的政治气氛让郭沫若感觉到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将成为中国的一个大的转折点，因而在这期间他怀着一颗高亢的“红心”去记录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他曾称自己是一名“容易激动”的诗人，而从这时期的他所写的诗歌的数量就可见其这位诗人心中的兴奋程度。

1958年的“大跃进”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运动，因而郭沫若十分赞成与拥护，他理解这场运动是非常必要的。而当时的郭沫若和新中国的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沉浸在这场高亢的运动之中，作为一名有着特殊身份的中共的文艺工作者，他怀着一颗高亢的“红心”用诗歌记录下了这时期的所见所闻。

因为文艺“大跃进”的影响，郭沫若在1958年3月30日开始写作诗组——《百花齐放》，诗人说：“这些诗三月三十日正式开始的。一九五六年做过三首（牡丹、芍药、春兰），除此之外，一共化费了十天工夫。感谢全国生产大跃进的东风，这东风一吹，便使百花齐放了。”<sup>[30]</sup>此诗组的内容非常符合郭沫若当时所要表达的思想。他用《百花齐放》表达着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心意，经过了“胡风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了中共高层的质疑，尤其是非共产党派人士，而此时的郭沫若作民主党派人士的代表人士已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身居政府要职的他应该做出表率，因而此时他用诗歌积极的向中共表白自己的忠心。他在《石楠花》一诗中写道，“同志，为什么不敢栽培我们？我们是多么愿意：向党交心肝！”<sup>[31]</sup>从诗文中可见郭沫若是如此急迫的想要表达自己对党的忠心。因此他用花代替自己，用自己最擅长的诗歌写出了长长的《百花齐放》表白自己立场的组诗。

他在该诗组中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桃花》一诗中他再一次申明：“我们是促进派，不是促退派。”<sup>[32]</sup>从而一再的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热切的表达自己的爱国心，他在《仙客来》一诗中写道：“请不要说我们来自外洋，来到中国就成土生土长。我们衷心地热爱中国人民，……”<sup>[33]</sup>在《蒲公英》一诗中他写道：“很好，我们实在是热爱中国的，我们是大地之子，别名叫地丁。”<sup>[34]</sup>在《麝香豌豆》一诗中他写道：“我们想从生产中得到改造，请求园艺家把我们下放。”<sup>[35]</sup>在《杏花》一诗中他写道：“复瓣的就只有先红而后白的花，请求植物学家把我们改造一下。”<sup>[36]</sup>这以花为名的诗组，对花的意趣描写甚少，而是试图让人们明确他的心意，这些作品使人十分明白他所要表达的真实的思想。

在这些表白中，是郭沫若对自己思想的一场清洗，这种写法符合郭沫若当时的心境。因为新中国正处于高亢、狂热的政治氛围中，作为非中共党内人士而又十分关注政治的郭沫若，尽管身居高位，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处于当时政治话语的中心，他担心被冷落，所以始终在向最高领导人与中共表忠心，表明要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以此获得新政权的可与重用。

诗歌理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1932—）对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他为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任务写诗，从某项政策的颁布到农村的学文化和防治棉虫。为了加强政治意识，他不惜以大量的标语口号入诗，著名的组诗《百花齐放》可以说是以简单的外形而装填流行的政治概念的标本。”<sup>[37]</sup>这些代替了他20世纪20年代初在诗集《女神》中的鲜明的自我意识，个性化的情感表现与强烈的批判色彩，而此时是概念的演绎和对事实的直观的描述，诗集《百花齐放》可以说是开了从“大跃进民歌”到六七十年代时兴一时的简单比附的咏物诗的先河。

在“大跃进”期间，郭沫若跟随着党的政策，极度热情地理解着党的政策。他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口号人”、“标语人”，当然他就将这些“口号”、“标语”一样的政策深入自己的诗歌中。正如有学者认为的，“他的这些诗，简直可以作为中国当代革命与建设简史来读。”<sup>[38]</sup>而此时的郭沫若正是怀着一种极度兴奋的心情用诗歌来展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蓝图。

诗人在1958年3月12日的《迎春序曲》一诗中写道：“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可实现；一个大跃进接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sup>[39]</sup>从诗中可看出郭沫若此时的对蓝图实现的坚定性，并随后又兴奋的加上夸张的诗句：“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sup>[40]</sup>“大跃进”的思想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思想也是相当契合的，因而这些都促使了郭沫若对现实极度畅想下产生了无比狂热的诗句，他对于“大跃进”给予了极大的歌颂，他表白了自己的思想，并且为新中国的未来而激动，并为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而兴奋，在他的诗作中几乎以近于疯狂和失去理智的状态作献媚的讴歌，到了被天下书生所耻笑的程度。

诗人面对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狂热、浮躁、虚假的社会风气，直面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现象，也直接诱发了诗人内心世界的虚无、毁灭与无奈，使这位在本质上作为一位民主主义战士与浪漫主义诗人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他理想社会的大厦在顷刻间坍塌下来。他从五四时代起执著追求的“自由”、“民主”和“光明”的宏伟目标，一时间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实的刺激和无情的嘲弄。所以诗人在无可奈何间又选择了短暂的逃避或者驯服。

1961—1962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较为宽松的时期。当时在紫光阁戏曲座谈会、故事片创作会议（即新侨会议）、广州会议上，中共领导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1901—1972），分别在不同会议上发表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艺术规律的长篇讲话，至此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政治气氛稍显宽松。并在1962年1月26日至2月26日，中共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而1961年的郭沫若进入了七十岁的高龄，在内心深处他也在痛苦地思考许多问题，“红色”思想开始在他的诗歌中淡化，他的诗歌形式也由新诗的创作转入更为内敛的旧体诗的创作，这显示他的思想由一种奔放的状态转入了一种逃避与婉约的状态。而这段时期创作最多也是最表现其这时期思想的是旧体的游记诗的创作。如：《访问古巴》、《昆明杂咏》、《回京途中》、《海南纪行》、《访泰山杂咏》、《昆明七首》、《游大理》、《再出夔门》、《游端州七星岩》、《访罗冈洞》、《海南西路纪行六首》、《江海行》、《咏福建二十二首》等等。他在游记诗中大量的运用旧体诗

的形式表达新的内容，更运用了旧体诗显示出诗的格律之美，这使得他此时的诗歌少了狂热的“红色”思想，诗人开始了逃遁，诗作中逐渐流露了本能的诗意追寻。

因而这时期的游记诗歌用旧体诗的形式很好地将郭沫若作为一名诗人的“本心”表现出来了，诗中少了前段时期的媚俗、浮躁与高亢，而更多的是回归到一种诗人的“本心”去写作，因而这段时期的诗作也带有了诗情。

但作为时代弄潮儿的郭沫若，他不甘蛰居书室，与世无争，他始终关心着政治，并且总试图一展身手，所以他为了谋取政治上的地位，屈服于权力或政治中心话语，以谋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的，有学者认为：“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郭沫若也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sup>[41]</sup>所以他很快又陷入了“红色颂歌”的怪圈，又重复了以前的步履。

从1963—1966年郭沫若的游记诗，已经没有了以往一度呈现的归隐与逃遁，而进行的是一种“红色”的记录。如1963年3月的《广西游记二十六首》，1965年6月的《井冈山巡礼》、1965年12月的《大寨行》，即是典型代表。

《广西游记二十六首》虽题为写景，实则是赞颂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的变化，此时的诗歌中写景抒情已经不是郭沫若的重点，而主要是对中共的一种正面歌颂。《井冈山巡礼》此诗组源于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建议，他建议郭沫若夫妇在去江西的时候去参观井冈山，这当然不是观赏风景，是有其政治目的，这也注定了此诗组所要展现出的思想状态。《大寨行》诗组源于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治体验，大寨的美丽动人来源于毛泽东的领导，这是对当时1965年“个人崇拜”的最好诠释，郭沫若写《大寨行》主要的任务就在于去展现其新中国实现的局布的桃花源景象，主要是为了赞颂毛泽东领导正确性。因此这个时期的诗组体现了郭沫若又回归到处于高压的“红色”政治下“诗歌”的写作状态，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诗人于1976年写下了的两首《水调歌头》：即《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sup>[42]</sup>，另一首为《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这两首词都是当时中国“文革”话语的表现方式，两者比较后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在诗艺上稍好：“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sup>[43]</sup>这完全是一篇红色决心书、效忠信之类的“媚上”之作，该作写于他逝世前两年，这显示了郭沫若1949年后其红色情怀的诗歌写作伴随了始终。

## 结语

在1949—1978这段时期，郭沫若的诗歌不可否认，“红色”政治伴随其中，他的作品所包含的思想也十分复杂。他这段时期的“红色”思想与社会氛围，个人理想和情感相融，他的内心与当时的政治氛围而产生出了一系列的变化，他经历了从真心地接受到外界压迫，而无法表达其内心的真实所感的心理变化。

诗人最初对新政权与领袖是发自内心的“红色”歌颂，但他后来处于“红色”政治高压中，

陷入了纯粹的“红色”政治诗歌之中。从本质看诗人的内心世界是无奈与荒诞的，现实的扭曲导致了他人格的扭曲，而人格的扭曲则造成了他诗歌创作的彻底变形。在这背后，隐伏着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社会道德、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深刻危机，这也是郭沫若无奈与荒诞心态的真实反映。在今天，我们对这一文学现象和精神现象深入探究，也许比对它的彻底否定更有价值。<sup>[44]</sup>

### 【注释】

- [1]何刚 李畅《“当代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部分专家观点摘要》，《郭沫若学刊》，2007年，4期，第22页。
- [2]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83页。
- [3]王锦厚《答丁东、魏明伦对郭沫若的辱骂——评〈反思郭沫若〉》转引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集·介亭杂文二集》，《郭沫若学刊》，2004年，1期，第75页。
- [4]载武汉《中央日报》1927年5月7、9、11、14、17、23日的《副刊》44、46、48、51、54、56、60号。1927年5月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作为16开单行本出版，现收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 [5]其后于中国上海，大东书局，民国20年(1931)出版。
- [6]郭沫若《沫若自传》(上卷)，求真出版社，2010年新版，第292页。关于河上肇与郭沫若的关系，日本已有很多的详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一海知义的《河上肇及中国》(1982年，东京：岩波书店)及三田刚史《苏醒的河上肇—近代中国的知之源泉》(2003年，东京：藤原书店)。前者以作为汉诗人的河上与中国的接触为出发点，严密地考察了被译为中文的河上肇的著作、论文等；后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扩展开来，中国也从中摄取了人道主义的倾向这一崭新的视角考察了河上对中国的影响。
- [7]周恩来《我要说的话》，载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 [8]凤子主编《人世间》(上海)1942年1卷2期。
- [9]敬文东《郭沫若的最后29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 [10]1949年7月郭沫若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0年3月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
- [11]丁东《陈明远谈郭沫若》，《口述实录》，2004年，5期，第10页。
- [12]郭沫若《我的做诗的经过》，山东大学等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郭沫若专集(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页。
- [13]同注4，《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2页。
- [14]郭沫若《我的做诗的经过》，山东大学等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郭沫若专集(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页。
- [15]《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 [16]《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34页。
- [17]《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29页。

- [i8] 郭沫若《沫若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 [i9]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95 页。
- [20] 《郭沫若全集·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95 页。
- [21]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02 页。
- [22] 《郭沫若全集·学编》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02 页。
- [23]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413 页。
- [24] 《郭沫若全集·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81 页。
- [2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413 页。
- [26] 《郭沫若全集·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81 页。
- [27] 上海市作协向全国作家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向全国表面上海作协两年内要完成的创作指标：创作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 4000 篇；两年中创作歌词 3000 首；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 12 部，讨论文学问题、评论作家和作品集 12 部，编辑中国文学批评选辑六种，选编现代文学思想斗争史 10 辑、现代革命文学选辑 20 辑，出版文学理论丛刊 8 辑。摘自：《读书文摘》 原文链接：<http://www.hao1111.cn/a/dswz/42581.html>
- [28] 转引自：敬文东《郭沫若的最后 29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第 106 页。
- [29] 敬文东《郭沫若的最后 29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第 107 页。
- [30] 《郭沫若全集·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72 页。
- [31]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10 页。
- [3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58 页。
- [33]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73 页。
- [3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77 页。
- [3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93 页。
- [36]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60 页。
- [37] 谢冕《20 世纪中国新诗：1949—1978》，载《诗探索》1980 年第 1 辑。岩佐昌 编译的《走进中国现代诗》（2012 年，福州：中国书店）中收录了谢冕的《20 世纪中国新诗概略：1919—1949》、《和新中国一起歌唱》、《文革后的中国现代诗》等文章。该译书作为日本唯一的介绍现代中国诗歌的通史（尽管基本上是中国著书的翻译），其中也收录了郭沫若的诗《骆驼》（1956）及其解说。岩佐先生还有专著《中国现代诗史研究》（2013 年，东京：汲古书院）。
- [38] 转引自敬文东《郭沫若的最后 29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第 119 页。
- [39]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240 页。
- [40]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240 页。
- [41] 丁东《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载《黄河》（中国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1996 年 4 期。
- [42] 郭沫若《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发表于 1976 年 5 月 12 日《人民日报》。
- [43] 郭沫若《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 年 10 月 21 日首先刊发于《解放军报》，11 月 1 日《人民日报》转载。
- [44] 日本的有关郭沫若“文学”的研究大部分还是围绕《女神》（1921）等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品，另外还有从他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的交流以及抗战期的亡命生活等多方面探讨了郭沫若和日本的密

切关系。但是，日本的研究界几乎没有涉及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前后）的郭沫若的著作。究其原因，大抵可以从竹内实《郭沫若的自我批判和文化大革命—被包围的中国历史学》（《朝日Journal》1966年5月22日号）窥见一斑。对被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文人们的某种失望大概是日本研究者们对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文学敬而远之的原因。

### 【参考文献】

- [01] 郭沫若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1—5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02] 藤田梨那《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沈阳，《社会科学辑刊》2012：02。
- [03] 涂鸿、彭秀坤《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的原型批评》，四川乐山，《郭沫若学刊》2004：3。
- [04]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05] 唐晓渡《郭沫若和新诗的现代性》，长春，《文艺争鸣》1997：01。
- [06] 林东海、史为乐选注《郭沫若纪游诗选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 [07] 郭沫若《沫若自传》（上、下卷），北京，求真出版社，2010。
- [08]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
- [09] 王继权 童炜钢编《郭沫若年谱》（上、下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 [10] 吴奔星 徐放鸣选编《沫若诗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 [11] 吴定宇《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 [12] 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3]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4] 蔡震《郭沫若的家事》，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
- [15] 孙党伯《郭沫若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16] 谢保成《郭沫若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 [17] 黄侯兴《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 [18] 卜庆华《郭沫若研究札记》，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
- [19] 曾宪通《郭沫若书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 [20] 敬文东《郭沫若的最后29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 [21] 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22] 山东大学等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郭沫若专集（1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 [23] 四川郭沫若学会《郭沫若学刊》（乐山），2000—2014年。
- [24] 一海知义《河上肇及中国》，东京，岩波书店，1982。
- [25] 三田刚史《苏醒的河上肇—近代中国的知之源泉》东京，藤原书店，2003。
- [26] 岩佐昌 编译《走进中国现代诗》福冈，中国书店，2012。
- [27] 岩佐昌 《中国现代诗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3。

（该文为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 2014 年度聘请单位西南民族大学重点引智项目“中日文化视野中郭沫若民族主义思想研究”项目成果）

On the "Red" Thoughts Transition in the Poems of China Modern Poet  
*Guo Moruo* after 1949

Tu Hong      Akiyoshi Shu

**Abstract:** The poems created by Guo Moruo after 1949 were admittedly in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he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refore the "Red" political works prais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revolution were indeed penetrating in his poem creation of this period. However, his "Red" thoughts, combined by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at time and the emotional status of himself, was underthrough trans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transition, from initially agreeing with the "Red" ideology from the bottom of the heart to the forced and helpless "Red" poem creation under high pressure political thoughts, is the transition from heart-felt voluntary to the external pressing under high pressure policy. His heart was absurd and tristed.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process of the "Red" ideology transition in the poem creation of Guo Moruo after 1949, through which to learn about his psychological journey and reflet the nature of the history and the time.

**Key Words:** Guo Moruo, after 1949, "Red" thoughts